

陕西师范大学国家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

张懋镕 主编

人兽母题纹饰卷

卢昉 著

科学出版社



陕西师范大学国家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张懋镕 主编

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

人兽母题纹饰卷

卢 昉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 人兽母题纹饰卷 / 张懋谔主编; 卢昉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6. 11

陕西师范大学国家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ISBN 978-7-03-050744-0

I. ①中… II. ①张… ②卢… III. ①青铜器(考古)—研究—中国
IV. ①K876.4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84363号

责任编辑: 李 茜 / 责任校对: 张凤琴

责任印制: 肖 兴 / 封面设计: 北京美光制版有限公司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6年11月第 一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6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6 1/4

字数: 385 000

定价: 18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本书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多卷本《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编写缘起

经过十几年的准备工作，多卷本的《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即将出版。回顾往事，真是百感交集。

30年前，我的处女作《释“东”及与“东”有关之字》发表，从那时候起，青铜器的学习与研究注定成为我一生的追求。

29年前，我开始师从李学勤先生研习古文字。中国古文字有很多分支，如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简牍帛书文字。先生告诉我：“你在陕西，陕西有很多青铜器，你就做金文研究吧。”在先生的指导下，我受到严格的学术训练，这令我终生受益。我的硕士学位论文是《周原出土西周有铭青铜器综合研究》。所谓综合研究，就是从青铜器、古文字、历史文献三方面来研究。从此综合研究成为我研究青铜器遵循的准则与方法。

1989年，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成立新的专业——博物馆专业，大概考虑到我本科学的是考古，于是把我从文献专业调到博物馆专业。除了继续讲古文字，又开了一门新课“青铜器鉴定”。自此之后，我开始系统研习青铜器，包括没有铭文的青铜器。

在长期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中，我渐渐对中国古代青铜器有了新的认识。

概而言之，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研究，自两宋以来，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近百年来研究，在青铜器的分期、分区系、分国别、分器类诸方面卓有成效，为世人所瞩目。

回顾历史，也毋庸讳言，我认为就青铜器基础性工作而言，其资料的整理还远远不够。且提一个最基本也是最简单的问题：迄今为止究竟有多少件中国古代青铜容器？（尚且没有涉及兵器、工具、车马器、钱币、铜镜等）几万还是十几万，恐怕连一个非常粗略的估计都没有，专家也说不清楚。家底不清，研究对象模糊，研究很难继续深入。由于中国古代青铜器资料十分庞杂，其收集、整理并非易事，所以这一部分的工作非常重要。说到研究，比如青铜器的定名，鼎、鬲、簋等各类器物的分类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各类纹饰的分类研究，纹饰和器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各个阶段铭文的特点，器物、纹饰、铭文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对断代的作用等等，其研究或不够系统，或不够深入，有些方面甚至是空白。

20多年来，我一直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写了《西周方座簋研究》《两周青铜盨研究》《西周青铜器断代两系说刍议》《试论中国古代青铜器器类之间的关系》《青铜器自名现象的另类价值》等文章，希望从器类、断代、地域、定名等多个角度和层面对青铜器进行探索。

同时我也十分关注国内外青铜器研究专家的成果，他们的论著是我案头的必备书籍，我经常地反复阅读，受益无穷。

在研究中，我深感个人力量的有限。从1999年招收青铜器方向研究生起，就逐渐形成了一个构想：如果研究生本人没有更好的研究题目，我就请他来作青铜器中的某一部分，整理、研究某一类青铜器，或某一类纹饰，或某一时段的铭文，等等。经过十多年的积累，已经完成了20多篇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其中分器类的整理与研究完成多半，某一地区、某一时段的铜器的整理与研究正在进行，纹饰与铭文的分类、分时段研究也做了一部分。这些为多卷本《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的编撰奠定了基础。同时，我注意到其他先生也在指导研究生做类似的学位论文，对我们也很有启发与帮助。

前几年，在编写《青铜器论文索引》的过程中，与北京线装书局的刘聪建先生多有接触。他听了我的上述介绍后，很感兴趣，遂与我商定，在原有研究生论文的基础上，由我主编，各专题作者分别著述，形成一套多卷本《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但由于种种原因，在线装书局只出了三卷。如今，在科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计划得以重新实现，拟在今后的若干年里，陆续完成和出版20卷以上的著作。

写作多卷本《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的目的拟在全面、系统整理青铜器资料，充分吸取古今中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青铜器的形制、纹饰、铭文、组合关系等方面作全方位考察和研究，并试图总结出关于中国古代青铜器产生、发展、消亡的基本途径、规律、特点及其原因。这是一个遥远的目标，但我们有信心一步一步地走近它。

由于这套多卷本《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的作者都是毕业不久的研究生，眼界有限、文字青涩也在所难免。我的指导也很有限，很多问题我也不懂或知之甚少。当时作学位论文时，我希望他们放大胆子去写，因此他们的观点与我也不尽一致。但无论如何，在阅读他们的学位论文时，在与他们的反复讨论、交流中，我也有很多的收获，这是最令人快乐的事情。我将阅读后的感想写出来，作为序言放在书前，就是希望继续与大家讨论，将《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延续下去。而随着一本本书稿的出版，这一批年轻的作者也正在走向成熟，这或许是比书稿的出版更有意义的事情。

最后要感谢参加我的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审阅论文的诸位先生，并希望今后继续得到你们的批评与帮助。感谢陕西师范大学暨历史文化学院给予的大力支持，感谢科学出版社李茜编辑的辛勤工作，让我们十几年来的梦想终于得以实现。

乙未年立冬后二日张懋镛写于
陕西师范大学中国青铜文化研究中心

试论纹饰对青铜器定名的意义

(代序)

张懋镕

对于青铜器研究来说，纹饰的研究非常重要。1994年，李学勤先生在为朱凤瀚先生的《古代中国青铜器》所作序言中倡导要加强美术史层面的研究。他说：“其间美术史这一层面，国内的工作应该说较为薄弱，有必要注入更多力量，开辟新的局面。”^①朱凤瀚先生在《古代中国青铜器》一书中，将纹饰研究工作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在青铜器断代上发挥重要作用，这是中国学者做得最多也是最有成就的方面。第二，从艺术和工艺史角度探讨纹饰的艺术成就和工艺水平。第三，从宗教、神话以及社会史的角度论述纹饰的内涵，即当时人们的意识形态及社会政治制度。朱先生认为关于第二、第三方面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②。2009年，朱凤瀚先生的新作《中国青铜器综论》出版，可以说是《古代中国青铜器》的增订本。全书页码翻了一倍，但具体到纹饰一章，只增加了16个页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纹饰研究进展不大，依然落后于形制和铭文的研究^③。

当然，近十年来，关于纹饰的研究还是有进展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不少美术史专业出身的人在研究青铜器。这些论著，大量使用青铜器纹饰资料，然后从艺术角度来观察分析^④。二是文物考古专业的研究人员和硕士生撰写的论文，有的是在文中专辟一章来论述，有的则专以某一时代、某一地区、某一类纹饰作为研究对象^⑤。可以说纹饰的研究遵从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正在细致、深入地向前发展。大量硕博士

① 李学勤：《古代中国青铜器·序》，《古代中国青铜器》，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1页。

② 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380~451页。

③ 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534~621页。

④ 杨远：《透物见人：夏商周青铜器的装饰艺术研究》，科学出版社，2015年。莫阳：《战国中山王墓研究——一种艺术史的视角》，中央美术学院博士论文，2015年。

⑤ 岳洪彬：《殷墟青铜器纹饰研究》，《三代考古》（二），2006年，科学出版社。唐际根：《关于中国青铜器纹饰的含义问题》，《三代考古》（四），科学出版社，2011年。苏辉：《中原地区商西周青铜器夔纹研究》，清华大学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张德良：《西周青铜器窃曲纹研究》，清华大学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

研究生的加入，有望开辟青铜器纹饰研究新的局面。

十年前，卢昉博士的硕士学位论文杀青，是当时少有的研究青铜器纹饰的学位论文^①。不久，她进入西安美院，从事美术学的教育工作，可谓如鱼得水。我也曾在西安美院做过演讲，担任美院的硕博士论文答辩的委员，多少有些感受。过去，做文物考古工作的学者，很少从艺术的角度去审视青铜器，即使有，也往往是粗线条的，较少艺术的眼光，难有独到的见解。艺术工作者在分析青铜器时则往往出现常识性错误，譬如误判年代，对青铜器的发展脉络和特点把握不准，也不大熟悉相关成果，所以研究很难深入。我们有对夏商周青铜艺术的宏观研究，也有对某一件青铜器的个案研究，但缺乏对某一类、某一地区青铜器的造型、纹饰作艺术方面的研究，从而导致宏观研究较为空洞，个案研究则很零碎。常见描述性文字，缺乏理论概括。比如某一类纹饰（涡纹）为什么要装饰在一些特定的器物上，纹饰的选择如何改变器物的造型等问题，很少有研究者涉及。窃以为一个好的青铜器研究者，应该具有历史文献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美术学四个方面的素养。卢昉博士早先毕业于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本科），继而在西大考古专业攻读硕士学位，研习青铜器，后来又在美术学院攻读文学（具体为美术学）博士学位，现在又在美术学院任教，对历史文献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美术学四个方面都有所涉猎，所以我对她的这部书稿寄予希望。

我对美术学知之甚少，无法像卢昉博士那样纵论艺术。记得朱凤瀚先生在“青铜器纹饰”一章中，有一小节是专门谈纹饰与器物造型的关系。他认为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使用什么样的纹饰，要从器物的造型特点来考虑，使纹饰与造型相协调，从而增加器物的美感。第二，对于动物造型的足、鋈、耳、捉手等部位，要装饰与之相适应的纹饰，达到造型与纹饰的完美统一。我的这篇序言要谈的是如何通过纹饰与装饰风格来推定青铜器的名称和功能，将容易混淆的器类区分开来。关于这个问题，以往的研究尚少，本文将提出众多例子来论证。

一、盂与无耳簋

在青铜器类中，以盛食器的相互混淆现象最为常见，因为盛食器的基本构造比较接近，差别不大。例如盂与无耳簋都是盛食器，功能相近，形制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有时存在混淆的现象，而纹饰则有助于我们将二者加以区分。下面略举几例。

有一件商代晚期的传世器葡簋（《商周》06202）^②（图1），常常被称作盂。形制像无耳的铜簋，从口沿以下腹部逐渐内收，不像盂的腹壁近于直壁，腹又那么深，

① 卢昉：《商周青铜器人兽母题纹饰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② 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本文简称《商周》。

而且通高只有22.5厘米,与一般的簋的大小相仿,如何称得上盂?陈梦家先生早就说过:“簋、盂之别恐在大小,盂通常较大。”^①从纹饰看,葡簋也更接近铜簋。葡簋颈部饰带状兽面纹,腹部没有纹饰,这一点像簋而不像盂。商代晚期的盂腹部很深,有很大的空间,通常装饰有花纹。葡簋圈足饰云雷纹,与九簋(《商周》03401)、耒册簋(《商周》03628)、卩鱼簋(《商周》03715)的纹饰与装饰风格一样,而盂的圈足是不装饰云雷纹的,大概是因为簋的圈足小,适合装饰云雷纹这样简单的纹饰,而盂的圈足大,理应装饰兽面纹之类复杂的纹饰。形制与葡盂相似的簋还有弜簋(《商周》03428)(图2)、爵簋(《商周》03440)(图3)、卫簋(《商周》03458)(图4)、矧簋(《商周》03552)(图5)、尹舟簋(《商周》03639)(图6)等。既然这些器物都被定名为簋,也反证葡盂应改名叫葡簋才对。



图1 葡簋



图2 弜簋



图3 爵簋



图4 卫簋



图5 矧簋



图6 尹舟簋

与葡盂相似的例子还有燕侯旅簋(《商周》06207)(图7),因其铭文“燕侯作旅盂”而定其为盂。此器连盖通高仅18厘米,如果减去盖高,大致在12厘米左右,如此小型的器物是不能称作盂的。只要将它与另一件燕侯饋盂(《商周》06209)(图8)作比较,情况就一目了然。后者通高24.5、口径33.8厘米,重6.45千克,只有如此体量的器物才能称作盂。这也有利于说明燕侯旅盂应是簋而不是盂。新近出版的《商周续编》著录一件燕侯簋(0322)^②(图9),通高12、口径19.5厘米,与燕侯盂(《商

①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中华书局,2004年。

② 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本文简称《商周续编》。

周》06207)大小差不多,也属于无耳簋,同样装饰兽面纹。此器被称作簋而非盂,可见类似燕侯旅盂这样的器物应是簋而不是盂。



图7 燕侯旅簋



图8 燕侯饋盂



图9 燕侯簋

二、盂与盂形簋

盂形簋是簋的一个亚种,是盂和簋相互影响产生的新品种,也有附耳,所以盂形簋很像盂,人们往往将二者混淆。盂形簋与盂的区别除了表现在器的大小之外(如前所言盂形簋小而盂大),重要的差别之一在花纹装饰上。

先归纳一下盂形簋的纹饰种类与装饰特点。盂形簋体量比较小,腹部比较浅,从观赏的角度而言,颈部是最重要的位置,自然也是纹饰布局的位置。所以我们看到,盂形簋的纹饰主要装饰在颈部,有一条带状纹饰,而腹部与圈足很少装饰花纹。另外我们已经说过,盂形簋是簋的一个亚种,与簋关系密切,盂形簋兴盛的时期在西周中期,此时的簋装饰崇尚简约,往往在口沿下布局带状纹饰,至于腹部有没有装饰,并不重要,盂形簋自然受到簋的影响^①。盂形簋的腹部通常没有纹饰或纹饰简洁。即使有也主要是瓦楞纹,像叔宾父簋(《商周》04462)(图10)那样装饰兽面纹的盂形簋,也只有一件。这一点与一般的簋的装饰风格很相似。



图10 叔宾父簋

盂的腹部则多有花纹,常见有垂叶纹、大环带纹,而这几种纹饰恰恰不见于盂形簋上。究其原因,是盂的腹部宽大,适合装饰垂叶纹、大环带纹这样需要较大空间的纹饰。

综上所述,盂与盂形簋的装饰风格有别,换言之,什么样的纹饰装饰在什么样的

^① 张懋镛:《试论中国古代青铜器器类之间的关系》,《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6年,137页。张懋镛:《论盂形簋》,《叩问三代文明——中国出土文献与上古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器物上是有讲究的。了解这一点有利于区分什么是盂，什么是簋。

叔簋(《商周》04128)(图11)，或称之为叔盂。其器腹壁较直，颈部两侧有一对附耳，与盂的形态一致。但它的通高只有15.5厘米，与盂的体量相去甚远。叔簋颈部所饰分尾鸟纹并不见于盂上，而多见于簋上，如伯彘簋(《商周》04226)(图12)、伯百父簋(《商周》04778)、伯棼簋(《商周》05078)、命簋(《商周》05082)(图13)等，所以叔簋应是簋而不是盂。



图11 叔簋



图12 伯彘簋



图13 命簋

滋簋(《商周》04697)(图14)，与叔簋一样，是一种盂形簋。或称之为滋盂。其铭曰：“滋作盂簋”，称盂的同时又称簋，难免让我们的研究者为难了。其实自名“盂簋”正好说明这种盂形簋是盂与簋相生的产物，既有盂的部分特点，也有簋的部分特点^①。它通高24.5、口径23厘米，体量还是接近簋而与盂差别较大。有趣的是滋簋口沿下饰两道弦纹，这种装饰未见于盂上。与滋簋装饰风格相同的还有一件所谓伯索史盂(《商周》06224)(图15)，颈部饰两道弦纹，但是这一件伯索史盂也不是盂而是簋。伯索史簋通高19.7厘米，与一般的簋相仿，也证明它不可能是盂，而是一件盂形簋。



图14 滋簋



图15 伯索史簋

三、豆与豆形簋

顾名思义，豆形簋形制如豆。其腹较浅，圈足高，上部如豆的柄部，有的在柄部中间有一圈突起的箍棱，与豆几乎没有什么差别。这是豆形簋易与豆混淆的一个重要

^① 张懋谔：《试论中国古代青铜器器类之间的关系》，《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6年，135~138页。

原因。为此，我们曾经专门著文讨论过豆与豆形簋的差别^①。绝大部分豆形簋口沿宽侈，腹壁自上而下内收，与豆不同。豆形簋都不高，在13~18厘米，而同时期豆的通高大部分在13厘米以下。豆形簋口径在17~24厘米，而同时期豆的口径没有达到15厘米的。豆形簋的腹深在7厘米以上，而同时期豆的腹深多在4~5厘米。

除了形制的不同，豆与豆形簋在纹饰和装饰风格上也有所差别。豆形簋装饰有瓦楞纹，譬如2006年陕西扶风五郡村窖藏出土的伯湄父簋（《商周》04358）（图16）；装饰长尾凤鸟纹，譬如父辛簋（《综览》小型孟94）（图17）；还有装饰夔龙纹以及兽头，譬如姜林母簋（《商周》04376）（图18）。以上三种纹饰频繁地出现在其他形态的簋上，但不见于同时期的铜豆上。商周时期铜豆上最常见的涡纹也同样不见于豆形簋上。这两点有力地说明豆形簋与簋关系密切，而与豆比较疏远。



图16 伯湄父簋



图17 父辛簋



图18 姜林母簋

1977年山东沂水县刘家店子墓葬出土的公豆（图19），因为自名为“簋”，所以发掘简报就理所当然地将它视为簋（《商周》06104）^②，其实它是一件豆。公豆通高35.4、口径24厘米，体量颇大，符合春秋时期的豆的形制通则，簋是没有这么大尺寸的^③。除了形制，从装饰方面也可以看出这件公豆与簋的差别。值得注意的是，公豆有盖，盖上有八瓣镂空莲花形捉手。这种装饰从未见于铜簋，而在豆类器上常见，如1932年山东曲阜林前村出土的厚氏元铺（《商周》06154-56）（图20）、宋公司铺（《商周》06157）（图21）、宋公固铺（《商周续编》0531-32）（图22）。附带说明一点，学术界的主流意见认为铺属豆类，是豆的一个分支，而不是簋^④。铺是圆器，

① 张懋镛：《关于青铜器定名的几点思考——从伯湄父簋的定名谈起》，《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第三辑，科学出版社，2010年，139~145页。

②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沂水县文物管理站：《山东沂水县刘家店子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9期，4页。

③ 一件传世的祖丁簋，陈梦家在《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科学出版社，1962年）中记载其通高35.7、口径22.8厘米，但是从图像（A193）来看口径明明大于通高，所以很怀疑其记载的准确性。

④ 李学勤：《青铜器中的簋与铺》，《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张懋镛：《试论中国古代青铜器器类之间的关系》，《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6年，134页。

簠是方器，二者绝不混淆。从豆与铺的盖上都装饰镂空莲花形捉手这一点来看，也可以说明两者的密切关系，而与簠没有什么牵连，簠上是没有这种装饰的。



图19 公豆



图20 厚氏元铺



图21 宋公司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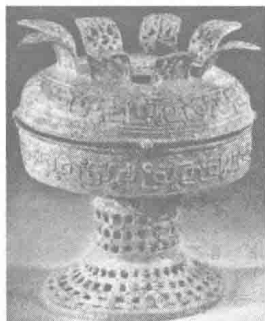


图22 宋公固铺

四、盂 与 盆

盂与盆也是容易混淆的两类器物。我们曾经写过两篇文章来说明两者的相同和相异点，以及区分的方法^①。将同一时期的盂与盆比较，两者在纹饰以及装饰风格方面还是有很大的区分。盂与盆颈部所饰纹饰的差别不大，主要表现在腹部。如前所述，因为盂的腹部较深，腹壁较直，所以适合装饰垂叶纹，用足够的空间来展示其下垂的态势，如伯盂（《商周》06222）（图23）、1969年陕西蓝田泄湖镇出土的永盂（《商周》06230）（图24）。也可以装饰庞大的顾龙纹，如1955年辽宁喀左马厂沟窖藏出土的燕侯盂（《商周》06209）（图25）。而盆的腹部较浅，腹部斜收，像一个倒梯形，无法装饰垂叶纹这样上下垂直的纹饰，所以看不到有装饰垂叶纹的盆，也没有庞大的顾龙纹。正是由于形制上的这种局限，很多盆选择素面的腹部，如中市父盆（《商周》06258-59）（图26）、1976年陕西扶风庄白窖藏出土的微彘盆（《商周》06252-53）（图27）、曾太保庆盆（《商周》06256）（图28）、虢叔盆（《商周》06210）（图29）。中市父是年代最早的自名为盆的青铜盆，盆一开始就选择素面的腹部，为盆的装饰定下基调，显示了盆与盂的差别。微彘盆和虢叔盆的体量都较大，通高分别为25.3、18.8厘米，口径分别为40、34.7厘米，重量分别为5.996、4.98千克，主人都是大贵族，他们也选择素面的腹部，说明这种选择更多是基于器形的需要而不是级别的差异。

^① 张懋镛：《青铜盆小议》，《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6年，128~132页；《再议青铜盆——从新发现的中市父盆谈起》，《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第三辑，科学出版社，2010年，164~169页。



图23 伯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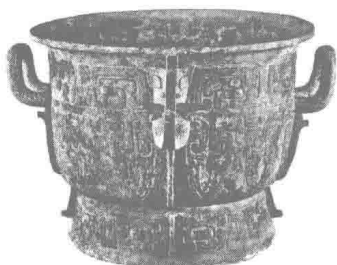


图24 永盂



图25 燕侯盂



图26 中市父盆



图27 微彘盆



图28 曾太保庆盆



图29 虢叔盆

虢叔盆（《商周》06210）因其自名盂而被称为盂，其实它的形制与盂没有什么相似之处，反倒与盆十分接近。侈口，束颈，折肩，敛腹，小平底，肩两侧双耳作半环状，这都是盆的基本特征。肩部所饰斜角目云纹，常见于簋类器上（无论是体量还是功用，盆与簋更相似一些），而不见于盂上。与虢叔盂相仿的例子还有善夫吉父盆（《商周》06223）（图30）、吴季大盆（《商周续编》0534）（图31），此二器也因自名为盂而被称作盂，但同样与盂在形态上没有什么相似之处。善夫吉父盆肩部所饰重环纹，常见于簋类器上而不见于盂上，所以善夫吉父盂应称为盆。善夫吉父盆通



图30 善夫吉父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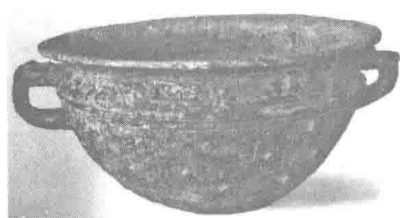


图31 吴季大盆

高20、口径35.1厘米，重7.6千克，体量与虢叔盆接近。附带说明一点，虢叔盆、善夫吉父盆都是盆类中较大者，就体量而言，不同于一般的盆而接近于孟，所以被冠以“孟”的自名。

有人固执于自名原则，对于虢叔孟、善夫吉父孟、吴季大孟等所具备的盆形器特点视而不见，这恐怕不是考古学研究应遵循的准绳。其实与虢叔孟、善夫吉父孟、吴季大孟形态一样的行氏伯爲盆（《商周续编》0539）（图32）就自名为盆。还有一件吴叔襄鼎，其铭曰：“唯吴叔襄自作宝孟。”（《商周续编》0171）（图33）明明是鼎，却自名为孟，难道我们也一味地跟着自名称其为孟吗？此鼎之所以自名为孟，只是源于其腹部形态像孟而已。明白了其中的原委，我们就可以不拘泥于所谓自名原则了。在尊重自名的前提下，更要用考古学类型学的分析方法来界定器类。



图32 行氏伯爲盆



图33 吴叔襄鼎

婁君盆（《商周》06226）（图34），通常被称作孟。敛颈，折肩，腹部斜收，平底较小，无圈足，这些形制特点，均符合盆的特征，而与孟相去甚远。虽然铭文自名为鎮孟，其实是盆，只不过它是盆中体量较大者，通高12.8、宽33.2厘米，与孟有一些相似之处。颈、腹饰蟠虺纹，这种纹饰也不见于孟上，所以从纹饰的角度，也能判断婁君孟是盆而不是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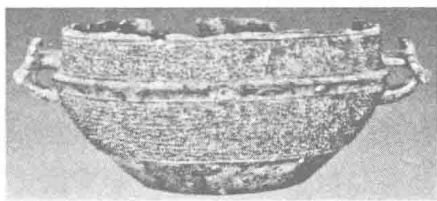


图34 婁君盆

《商周续编》著录一件比孟（《商周续编》0533）（图35），私人收藏，此前未曾见过。其铭曰：“比易（锡）金于公，用作宝彝。”铭文没有提到这件器是不是孟，《商周续编》定其名为孟，大概是看到此器有附耳，与孟极像。这件器形制罕见，像盆，因为它是束颈折肩、收腹平底，符合盆的基本要求；又像孟，因为它有附耳，迄今未见西周青铜盆有附耳者。不过，我们还是认为它不是孟而是盆。从形制看，它是盆，至于有附耳，应是受到孟的影响。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件器上的纹饰特别，肩部饰一周菱形纹，这种纹饰以及装饰风格，不曾出现在青铜孟上，恰恰出现在

盆上。譬如天马一曲村M7176和M7164分别出土一件菱形纹盆^①（图36），除了颈部设有衔环耳外，形制、纹饰都和比盆非常相似，都是束颈，折肩，斜收腹，底部较小，肩部饰一周菱形纹。年代与比盆一样，在西周中期。



图35 比盆



图36 菱形纹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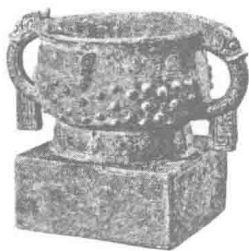


图37 比簋

与比盆铭文相同的还有一件比簋（《商周》04537）（图37），其铭曰：“比易（锡）金于公，用作宝彝。”不仅内容一样，字形书体也无二致，故知为同人之器。这两件器的字形书体与同时期的晋国铭文相近，锈色也有晋南青铜器的特点，很可能出土于晋南地区。目前看到的青铜盆以晋南地区出土为多，这也为比盆的定名增加了胜算。

不过有一点很有意思，到了西周晚期，盆与孟的纹饰以及装饰风格有趋近的表现，这是青铜器器类之间相互影响的结果。譬如伯孟（《商周》06206）（图38），颈部饰夔龙纹，圈足饰目雷纹，其装饰部位和纹饰特点与盆没有什么区别，不同的是形制与体量。伯孟有附耳，腹壁圜收程度不大，这些都是孟的特征。伯孟通高28.7、口径42.8厘米，重12.2千克，比盆要大得多。所以伯孟是孟而不是盆。与伯孟情况相似的还有作父丁孟（《商周》06219）（图39），体量也很大，通高29、口径42厘米，只是纹饰与同时期盆相似，颈部饰窃曲纹，圈足饰斜角目雷纹。显然，对它们的鉴别，就只能看大小，而不能看纹饰了。



图38 伯孟



图39 作父丁孟

① 邹衡：《天马一曲村（1980~1989）》，科学出版社，2000年。

五、盂 与 鉴

盂既是食器，也是水器，而鉴是水器，所以盂与鉴也有相互混淆的例子，这从自名现象中可以看出。只不过当青铜鉴在春秋中期兴起时，青铜盂正走向衰落，所以两者相处的机会和时日不多，混淆的例子自然少之又少。

1994年山东海阳嘴子前村春秋墓出土听鉴（《商周》06215）（图40），因其铭文曰：“听所献为下寝盂”，故论者都名其为盂。然而观其形制，敞口，宽平沿，颈部收缩，腹部较深，下腹收敛，平底无圈足，颈部双耳扁平，这都是铜鉴的特征。纹饰与装饰风格也与盂迥然不同，从口沿下到下腹部，装饰四道双头龙纹。有纹饰的铜鉴大多是这样装饰的，譬如智君子鉴（《商周》15052-53）（图41）、吴王夫差鉴（《商周》15059-63）（图42）。如果不是因其自名为盂，相信没有人会将其归为盂类，所以不能盲目地相信自名。可见，听盂应更名为听鉴。



图40 听鉴



图41 智君子鉴



图42 吴王夫差鉴

六、尊缶与浴缶

在春秋战国时期，南方盛行缶器。一种是盥洗用的缶器，自名浴缶，一种是盛酒用的缶器，自名尊缶。两者功能不同，形制也有差异，通常尊缶高大，通高超过腹径许多；浴缶宽侈，通高与腹径基本相当。有趣的是两者的纹饰也有区别。浴缶上常常装饰涡纹，因为涡纹与水器有关。张婷有一篇论文，指出涡纹多装饰在盘等水器上^①。这说明过去将涡纹指认为火纹，是没有多少依据的说法。作为酒器的尊缶则极少装饰涡纹。要证明这一点，看看同一器主拥有的浴缶与尊缶的差异性就一目了然。譬如作为同人之器的柶浴缶（《商周》14053-54）（图43）盖面与腹部装饰涡纹，而柶尊缶装饰蟠虺纹，未见涡纹（《商周》14055-56）（图44）；彭射浴缶盖面与腹部装饰涡纹（《商周》14058）（图45），而彭射尊缶通体素面（《商周》14057）（图46）；蔡侯盥缶盖面与腹部装饰涡纹（《商周》14063）（图47），而蔡侯尊缶装饰兽纹，未见涡纹（《商周》14065）（图48）；曾侯乙浴缶盖面与腹部装饰涡纹（《商周》14072）（图49），曾侯乙尊缶装饰蟠螭纹和垂叶纹（《商周》14071）（图50）。

① 张婷：《浅析商周青铜器上的圆涡纹》，《四川文物》2006年第5期，69页。